

· 权威修订版 ·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世界文明史

拿破仑时代【下】

THE AGE OF NAPOLEON

[美] 威尔·杜兰特 阿里尔·杜兰特 | 著
台湾幼狮文化 | 译

非外借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世界文明史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拿破仑时代 【下】

THE AGE OF NAPOLEON

[美] 威尔·杜兰特 阿里尔·杜兰特 | 著
台湾幼狮文化 | 译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明史·拿破仑时代 / (美) 威尔·杜兰特,
(美) 阿里尔·杜兰特著; 台湾幼狮文化译. —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455-2187-0

I. ①世… II. ①威… ②阿… ③台… III. ①世界史
— 文化史 ②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 —
生平事迹 ③法国—近代史—1774-1815 IV. ①K103
②K835.65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0367 号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Huaxia Winshare Books Co., Ltd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THE AGE OF NAPOLEON: 1975 by Will and Ariel Durant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21-2016-310

世界文明史：拿破仑时代

出品人 杨政
作者 [美] 威尔·杜兰特 阿里尔·杜兰特
责任编辑 陈文龙 杨永龙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85mm × 250mm 1/16
印 张 57.75
字 数 1031千
定 价 138.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2187-0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第五章 | 日耳曼与拿破仑

(1786—1811)

神圣罗马帝国 (1800)

普鲁士的爱国者，也是伟大历史学家的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认为：“自从路德的时代以来，日耳曼从没有像现在（1800年）这样，在欧洲占据了如此显赫的地位，我们的国家拥有伟大的英雄和诗人。”我们可能将胜利的腓特烈二世列于败灭的拿破仑之下，但是无疑地，歌德和席勒，从爱丁堡到罗马，在诗和散文上闪耀了无与伦比的光辉。而日耳曼的哲学家，从康德经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到叔本华，慑服了从伦敦到圣彼得堡的欧洲人的心灵。这是日耳曼的第二次文艺复兴。

假如国家的定义是一群人生活在共同的政府和法律之下的话，那么日耳曼像16世纪的意大利一样，并不是一个国家。1800年的日耳曼是一个约有250“国”的松弛联结，每一“国”各有法律和税收，很多“国”有自己的军队、币制、宗教、风俗和服装，有些“国”所讲的方言甚至连半个日耳曼世界都无法了解。不过，它们所写的文字是相同的，这使它们的作家潜在地拥有1/3欧洲大陆的读者。

附带地，我们应该注意到，如同文艺复兴中的意大利，这些国家的独立允许一种不定型的多样性、一种刺激性的竞争及一种人格、实验和思想的自由。而这些，在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大国中，可能早已被压制。日耳曼的这些依然如此深具魅力、

绝无仅有的古老城市，如果也和法国诸城对巴黎的关系一样的话，不是早就失去其生动性和个性了吗？而且假如日耳曼的所有这些地区组成了一个联合国家的话，那么这个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欧洲核心国，不早就无法抵御地占领了全欧洲了吗？

只有在一点上，日耳曼诸国的独立才受到限制：他们全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分子，神圣罗马帝国在800年始于教皇加冕为国王的查理曼——为日耳曼人所熟知，就像他们自己的法兰克·查理大帝一样。1800年，这个帝国对日耳曼诸国有了个令人目眩的改变。最显著的是9个选举国王的“选帝国”（electoral state）：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不伦瑞克—吕内堡、科隆、美因茨、汉诺威和特里尔。其次是27个由天主教高级教士统治的“圣国”（spiritual land），仿佛是千年前濒临灭亡时的西罗马帝国主教统治城市的复活：萨尔茨堡的总主教管辖区，明斯特、列日、维尔茨堡、班贝格、奥斯纳布吕克、帕德博恩、奥格斯堡、希尔德斯海姆、福尔达、施派尔、雷根斯堡、康施坦茨、沃尔姆斯、吕贝克等的主教辖区。王侯统治27国，包括黑森—卡塞尔、黑森—达姆施塔特、荷尔斯泰因、符腾堡、萨克森—魏玛、萨克森—哥达、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巴登、卡尔斯鲁厄等地在内。50座城市是帝国直辖城市（*Reichstädte*），是自治的帝国自由城市：汉堡、科隆、美因河的法兰克福、不莱梅、沃尔姆斯、施派尔、纽伦堡、乌尔姆等。选帝侯、“帝国骑士”（Imperial Knight）以及其他代表，在他们国王的召集下，从这些地区或日耳曼的其他区域来到雷根斯堡参加帝国议会。1792年，选帝侯选了奥地利的弗兰茨二世来领导神圣罗马帝国，而且以一种奢华的仪式来加冕他，吸引了日耳曼各地的著名人士来到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他成了这个历时久远帝国的最后一位国王。

1800年，这个曾经一度是感人且慈善的机构几乎完全失去了它的效能和用途。它是封建制度的遗迹，每一部分由一个采邑领主统治，而臣属于一个中央权力；而中央权力由于分子国在人口、财富、世俗主义和军事力量上的成长而削弱。这个“神圣”王国的宗教统一因宗教改革、三十年战争和“七年战争”而结束。1800年，北日耳曼是新教，南日耳曼是天主教，而它们对法国的启蒙和莱辛时代的开化已失去部分的热诚。宗教衰微时，由于教条政治或社会的因素，逐渐兴起的民族主义必定团结一个社会，以对抗其组成分子离心的利己主义。

由普鲁士领导的新教北日耳曼和由奥地利领导的天主教南日耳曼的分裂导致了可悲的结果：未能在1805年的奥斯特利茨或1806年的耶拿团结一致地抵抗拿破仑。在这些打击之前，奥地利对帝国议会早已不加理会，其他各国纷纷起而效之。1788年，100位合格的王侯会员中仅有14位，50位合格的城主会员中仅有8位服从帝国议

会的召唤。决议成了不可能达成。在坎波福尔米奥（Campoformio，1797年）和吕内维尔（Lunéville，1801年）的条约中，拿破仑强迫奥地利承认法国在莱茵河左岸（或两岸）的统治权，神圣罗马帝国的富饶地区，包括施派尔、曼海姆、沃尔姆斯、美因茨、宾根（Bingen）、特里尔、科布伦茨、亚琛、波恩和科隆在内，转移于法国的统治之下。1801年的神圣罗马帝国，正如伏尔泰所言（亦为一般人接受）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没有一个重要成员国承认它的权威或教皇的权威。在这些混乱中，某种新形式的纪律和协调必须被计划接受或强迫接受。拿破仑接受了这个挑战。

莱茵邦联（1806）

这条伟大的河流有时被视为珍藏着建筑上瑰宝的奇伟景致、历史性记忆的一道画廊，也是经济上的天然恩赐：灌溉丰饶的土壤，将每个城市与其他12个在文化和产品贸易上互相匹敌的城市联结起来。商业和工业在河两岸生长时，封建制度在此失去了它的效用和尖牙。但在这流畅的繁荣中，四个问题恶化了：统治阶层中享乐主义的盛行，官僚政治的腐败，分裂性的财富集中，及军事崩溃而招致征服者。

开拓莱茵诸国新道路的是法国和奥地利：答应以新的财产来补偿那些由于奥地利承认法国在莱茵河左岸统治权，而丧失土地的日耳曼著名人士。这些失去产业者要求复产的喧闹使法国和奥地利在拉施塔特召开集会（1797年12月16日）。一些不相干的王侯建议教会的主权应该“世俗化”——用易解的言词来说，从统治中的主教转移到失去产业的俗人手中。由于难以一致，集会提议将此事移至下次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会议中再做讨论。但一直搁置着，直到拿破仑从埃及回来，在法国掌握政权，在马伦戈打败奥地利，与奥地利、普鲁士、俄国订立条约。由此，1803年2月25日，一个帝国会议的代表团发出了一项法令，一致同意命名为“帝国委员主要决断”，草草地重改西日耳曼的地图和统治方式。几乎所有统治中的主教都失去了产业。普鲁士平静地接受教会统治的减少，奥地利虽曾哀伤，却无能为力。

新的统治者了解到奥地利不可能、也不会愿意给他们军事保护，而且他们（多半为天主教徒）也不期望普鲁士新教徒的保护。于是一个接一个地，这些重划的国家转向了武力至上、身为天主教徒的拿破仑。1805年12月30日，美因茨的总主教选帝侯达尔贝格在慕尼黑会见了刚从奥斯特利茨打胜仗归来的拿破仑，邀请他接受这些重新组织过的公侯国的领导权。这位忙碌的国王花了半年的时间来做决定。他认

为：以法国一个国家若擅取1/3日耳曼为保护国，将会再度激化英国和俄国的敌对，而且招致其他国家的仇视。1806年7月12日，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拿骚、贝尔格和其他许多国家联合组成莱茵邦联（*Rheinbund*）。8月1日拿破仑同意将其纳为保护国。虽然主要组成分子国在内政上保留独立自主权，但在外交政策上，它们同意服从他的判断，而且设置坚强的军事力量供其支配。它们通知弗兰茨二世和帝国议会，声明它们不再为其会员国。8月6日，弗兰茨二世正式宣布神圣罗马帝国解散，放弃帝国的称呼，只保留奥地利国王。哈布斯堡王朝的光辉消失了，而一位新的查理曼——从法国来的统治者——在西日耳曼滥施威权了。

邦联在做出一系列让步的同时，得到了《拿破仑法典》（包括封建税和教会什一税的废止在内）、宗教礼拜的自由、法律面前平等、法国地方行政长官的管理体制，却有一个较诸从前更难贿赂、训练有素的司法部。这个结构的主要缺陷是其仰仗外力，而且只有在外国的保护比其国内的牺牲更重要时，才能继续存在下去。1809年，拿破仑要日耳曼子弟前去和奥地利战斗时，邦联显得不自然了。1812年，他驱使成千上万的日耳曼子弟前去和俄国战斗，而且要求庞大的军费支持时，邦联似乎是贪图小利而蒙受大害了。1813年，邦联日耳曼人被征召前去和普鲁士日耳曼人战斗时，邦联只不过是等待一次法国的重大逆运，然后将这整个脆弱的建筑物放在这位筋疲力尽的科西嘉人的头上罢了。

此时，拿破仑对法国的新边境安排了一个双层安全保障。这对于他来说，是一项胜利。莱茵河的西区已并入法国，而东岸的富庶地区（甚至延伸至易北河）现在也与法国有联系，而且依赖法国。1813年，拿破仑在莱比锡战役失败之后，邦联瓦解了，却留给了俾斯麦（*Bismarck*）一个纪念，而拿破仑的意大利统一也留给了马志尼、加里波第和加富尔一个启示。

拿破仑的日耳曼诸省

科隆的北方有两个地区，虽为莱茵邦联的成员，但因为战争而完全属于拿破仑，为他或他的亲戚统治：贝格大公国是他的妹夫缪拉，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则是他的弟弟热罗姆。缪拉擢升到那不勒斯（1808年）时，拿破仑借行政长官来统治全国。年复一年，他介绍法国的管理法、税法 and 法律。已经萎缩的封建制度结束了，直到这个地区成为繁荣的采矿和冶金中心，工业和商业都有发展。

威斯特伐利亚更是变化多端，领土更大。她的西端是克莱弗公国（始为亨利八世第四任妻子的封地），由此向东伸展经过明斯特、希尔德斯海姆、不伦瑞克和沃尔芬比特到马格德堡，经过帕得博恩到卡塞尔（首府），穿过鲁尔河、埃姆斯河和利珀河，到达萨勒河和易北河。

热罗姆于1807年登上王位，当时年仅23岁，对享乐较权力更有兴趣。拿破仑希望责任能使他成熟、稳定，寄给他一些感人至深的劝告书信，可是这被财政榨取阻遏，热罗姆发觉在收入上很难满足他哥哥的要求及他自己奢侈的宫廷生活方式的享受。即使如此，在拿破仑征服的创造时期，他在提倡改革上和拿破仑合作得非常有效。拿破仑的格言之一说道：“人们无权决定未来，只有法律决定国家的命运。”因此他给了威斯特伐利亚一部法典，有效而且相当诚实的管理、宗教自由、司法部、陪审团制、法律面前平等、相同的税制及定期审查所有政府部门的体制。

一个国家的议会由一次有限的投票选出，100位代表中的15位选自商人和制造业者，15位则自著名学者和其他知名人士之中选出。这个会议无权立法，但能批评由国家议会对立法提出的议案，而这种劝告经常是被接纳的。

基本的改革是经济上的。封建制度结束了，自由企业开放其所有领域给有雄心的人。道路和水道加以保养和改善。内部通行税取消了，度量衡在全王国内统一。1809年3月24日的法令规定，每个自治村须对其穷人负责，命令其供给他们工作和粮食。于是纳税者开始抱怨了。

文明的威斯特伐利亚是日耳曼诸国中最进步的一国。早在福尔达的修道院图书馆以古典手稿来培育文艺复兴思想时，它已经培养了理智的生活。希尔德斯海姆已有莱布尼茨，而沃尔芬比特有莱辛。现在热罗姆国王有他的图书馆员，即条顿族哲学的创始者格林。1807年，在拿破仑的邀请下，缪勒——当时的历史学泰斗——放弃了他在柏林皇家史料编纂官的职位，来到威斯特伐利亚当国务卿及国家教育的总监（1808—1809年）。威斯特伐利亚在当时有五所大学，经由热罗姆重整为三：哥廷根、哈雷和马尔堡。其中之二声名响彻全欧。我们看到柯勒律治直接从下斯托威到哥廷根。一年后，被日耳曼思想迷得晕陶陶地回到了英国。

与这些恩赐相对的是严重的罪恶：课税和征兵。拿破仑要求他的每个属国给予他的政府、他一天比一天更加奢侈的宫廷和他的军队的开支一项充实的奉献。他的论据非常简单：假如奥地利或其他反动的力量打败或者罢免他的话，那么他曾经带给他们的这些恩赐就会被夺去。基于同样的理由，为军事训练提供健儿及必要的牺牲生命的义务——在他保护下的诸国要和法国共同分担。直到1813年，热罗姆的臣

民刚毅地忍受了下来，毕竟，惩罚是未知的，而晋升是依据功绩，任何一位士兵都可能成为一位军官，甚至一位元帅。但是，1813年，威斯特伐利亚送了8000名年轻子弟到西班牙、1.6万名到俄国，以供拿破仑驱使，而从西班牙生还的只有800名，从俄国生还的只有2000名。

威斯特伐利亚的东北方是汉诺威选帝侯的领地。1714年，它的选帝侯膺任为英国国王乔治一世，而汉诺威就成了英国的一个属国。而当时的选帝侯是乔治三世，他使它成为大不列颠辖下的一个支点。因此他让汉诺威的一些大地主统治这个省份。“那是为了日耳曼中最独占的贵族政治的利益。所有有价值的地位……全由贵族垄断……他们小心地不让课税的重担落在自己的头上，而让公民和农民奉献大部分。”封建制度复活了，而被几乎是一种家庭中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缓和。当地的政府诚实无欺。

1803年，英国重燃战火，拿破仑命令他的军队和行政官控制汉诺威，防备英军的登陆，并排拒所有英货的进口。法军遭遇了少许的抵抗。1807年，忙于处理更大事务的拿破仑，将汉诺威附属于威斯特伐利亚，而置于热罗姆国王负担颇重的策略之中。汉诺威人祈祷重回英国的怀抱。

和汉诺威相反，汉萨同盟的城市（Hanseatic cities）汉堡、不莱梅、吕贝克，却是繁荣和骄傲的安息所。同盟本身很久以前便不存在了，但在法国控制下的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的衰落，使其多数贸易转移到了汉堡。位于易北河河口的这个城市——1800年自夸其拥有11.5万人口——似乎是专为海上贸易和进口货物的迅速再装载而设计的。它由商人和资本家控制，但由于某种程度的技巧和公平，他们的垄断令人能够忍受。拿破仑渴望将这些商业城市纳诸其统治之下，禁止它们买卖英国输入品，而且借着他们的贷款帮助他负担军费。他派遣布里埃内和其他人去阻止英货流入汉堡，贪婪的前国务卿因全然漠视而致富。终于，拿破仑将这座大城市置于其统治之下（1810年），但大为市民所恼，他们组织秘密社团去暗杀他，并且日复一日地图谋他的灭亡。

萨克森

威斯特伐利亚的东方和普鲁士的南方是一个日耳曼国家，她的市民称她为萨克森，法国人称她为“萨克斯”（Saxe）。她曾经一度从波希米亚伸展到波罗的海，

在大不列颠，她曾遗留下“Sexes”的名字，最近遭到“七年战争”的破坏。如今是一个扩展到易北河的左右两岸，从路德的维腾贝格，到德累斯顿——日耳曼的巴黎的繁荣的选帝侯领地。

在先是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都三世（1768—1806年），后来是国王腓特烈·奥古斯都一世（1806—1827年）的长时期统治下，加上如母亲般滋养她的易北河的恩赐，很快恢复了她的繁荣。德累斯顿再次沉浸于洛可可式的建筑，宽广的大道和美观的桥梁，西斯廷圣母^[1]和迈森陶器的欢乐之中。这位年轻的统治者虽然不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却深思熟虑地治理其王国，小心翼翼地使用税收、偿还国债及在弗莱堡发展了一所著名的矿业大学。德累斯顿的对手——莱比锡——重新开始其一年一度的书籍展览会，在这里，从欧洲各处而来的出版者提供他们最新的出版物，而日耳曼昌盛的文学引导了理智的行列。

“公正者”腓特烈·奥古斯都加入普鲁士和奥地利企图控制法国革命的阵营，而分担了1792年在瓦尔密的挫折。他的堂弟路易的受刑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但他很乐意参加1795年与法国的和谈。拿破仑大权在握时，腓特烈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而拿破仑尊他为受他的人民爱戴的一位开明专制君主。然而，1806年拿破仑的军队逼近耶拿时，腓特烈就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拿破仑警告他别让普鲁士军队通过萨克森，而普鲁士坚持并入侵，结果选帝侯投降，而且让他少数的军队加入普军的阵容。胜利的拿破仑相当仁慈地和腓特烈谈判：要求2500万法郎的赠款，命令他改称为萨克森王，让他当华沙大公国的首脑，强迫普鲁士割让斯普里河西岸的科特布斯及周边地区给萨克森。北方和东方处于波兰之间，西方是威斯特伐利亚，南方则为萨克森，普鲁士于是被已向拿破仑宣誓的国家所包围。普鲁士步日耳曼其他国家的后尘而臣属于拿破仑的法国，似乎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普鲁士：腓特烈的遗产（1786—1787）

腓特烈二世大帝去世时，普鲁士王国是由勃兰登堡选帝侯的领地，西里西亚和更远的波美拉尼亚公国，东普鲁士诸省——包括柯尼斯堡、弗里德兰和梅梅尔，1772年从波兰得来的西普鲁士，及数个在西日耳曼包围的领土，包括东弗里德兰、

[1] 意大利皮亚琴察的西斯廷圣母教堂中拉斐尔画的圣母像。现在德累斯顿的皇家美术馆。

明斯特和埃森等组成。腓特烈死后，普鲁士又增加了领土：波兰第二次瓜分（1792年）中的托伦和但泽地区，波兰第三次瓜分（1795年）中的华沙和波兰心脏区，1791年的安斯巴赫、拜罗伊特和曼斯菲尔德，1797年瑞士的纳沙泰尔等地。拿破仑解除普鲁士这项兼并的任务时，普鲁士似乎下定决心要吞并全部的北日耳曼了。

使普鲁士势力的扩张成为可能的人是腓特烈大帝的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除了训练他的儿子和他的人民沉默地忍受痛苦之外，还留下了最好的军队，及一个由普及教育、普遍课税和普遍兵役紧密组成的国家，普鲁士成为适合一位好战国王胃口的一道佳肴。全欧、全日耳曼、全普鲁士看到这位食人的君王，他专制、高傲的贵族军官，及他身長6英尺的高大步兵时，全都战栗了。“别长高，”一位母亲警告他的儿子说，“否则你将被征召入伍。”

向这样的军队和国家，腓特烈大帝加入被伏尔泰磨炼的个人天才和根植于骨子里的禁欲主义。他将普鲁士由一个只堪与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匹敌的小王国，变为一个足与日耳曼世界中的奥地利抗衡的国家，而且成为阻挡多产的斯拉夫族再度抵达他们易北河旧有边界的持续压力的最强屏障。对内，他建立了一个以正直闻名的司法部，一个逐步取代贵族以为国家官吏的行政组织。他开创言论、出版和礼拜的自由，在他的保护之下，“日耳曼的学校制度取代了教士教育极深的精神呆滞”。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能哄骗伏尔泰、教导拿破仑的男人。“伟大的腓特烈，”1797年拿破仑说道，“是一位我乐意在任何事上，在战争、行政上商谈的英雄，我曾研习他军中生活的戒条，他日常的书信是我的哲学课程。”

在他的成就中有若干的缺陷。在他的战役中，他抽不出时间来使普鲁士的封建制度到达莱茵河流域诸国曾到达的更加人文的水准，而且他的战事使他的人民处于一种贫穷和精疲力竭的境况。普鲁士在他死后的衰微，他是该负部分责任的。腓特烈二世和他无子的叔父趣味相反，他喜好女人和艺术更甚于统治和战事。他在与第一任太太婚姻存续期间包养了一个情妇，她为他生了5个孩子。他和他的太太于1769年离婚，另和弗雷德里克·露易斯结婚，她为他生了7个孩子。而在这次婚姻中，他说服了他的宫廷牧师让他和平民女子朱莉·冯·福斯缔结鸳盟（1787年），她两年后去世；然后是女伯爵索菲·邓霍夫（1790年），她为他生了1个儿子。他抽时间去拉大提琴，欢迎莫扎特和贝多芬的访问，创立一所音乐学院和一所国家剧院。他负担经费，颁布了包含许多宽大要素的新法典。他进行一项宗教改革，准许他最喜爱的革新理性论者约翰·冯·沃尔纳（Johann von Wöllner）发布一项宗教令，结束宗教信仰自由，创立一种检查制度，驱逐了许多柏林的作家。

他的对外政策采取防御措施。他不愿继续他前任者的攻击姿态，藐视百年来的先例，企图和奥地利建立友谊以为朝向日耳曼和谐和安全的一个主要步骤。他不喜欢法国大革命，满足于君主政体（他的人民也如此）。他派遣部分军队参加了在瓦尔密所打的败仗（1792年），但是他很高兴带回那些生还者去为他在波兰的第二次瓜分中出力。1795年，他与法国签订《巴塞尔和约》（*Peace of Basel*），使他得以在第三次瓜分中自由地取得华沙。

姑且不论他的学识，他使他的国家在财富和势力上衰微。早在1789年，米拉波在长住柏林之后，预言道：“普鲁士君主政体的结构使其不能应付任何的灾难。”陆军的纪律日趋松弛、骄慢无礼，官僚政治已因腐化和阴谋而不振，国家的财政一片混乱，近乎破产。“唯有经历战争，才能暴露出这个一切活动因旧有声威的魔力而麻痹的、隐蔽时代的内部腐败。”

普鲁士的崩溃（1797—1807）

多情的国王去世了，照顾这个病态国家的重担落在他儿子腓特烈·威廉三世的肩上，历经拿破仑、梅特涅，他将国家继续维持至1840年。他意志薄弱、感情温和，因之他能延续如此长久的时间，众人皆感讶异。他有着一个好公民所具有的一切美德：合作、正义、仁慈、谦和，忠于婚姻，热爱和平。他解放所有王室土地上的农奴。1793年，他和梅克伦堡—史特雷利茨公国的露易丝结婚，她年方17，美丽而具有热烈的爱国心，不久就成了全国的偶像。她依然是欢乐的主要源泉，但他似乎将所有的灾难引入其中。

这个新世纪带给了他一个接一个的危机。1803年，法国攫取了汉诺威，它的中立性曾为普鲁士保证。于是，陆军的年轻军官们喧嚣着，即使不发生战争，也要与法国绝交，但腓特烈·威廉保持他的和平。法军闭锁了威悉河和易北河的河口，伤害了普鲁士的贸易，但腓特烈主张忍耐。露易丝王后恳求战争，穿着印有她名字的军服，骑在马背上游行，在未曾败北的陆军中燃起火焰。斐迪南王子，国王的表兄，渴望得到一个表现他勇气的机会。年迈的不伦瑞克公爵提议领导普鲁士陆军，布吕歇尔将军——滑铁卢的未来英雄，支持他。腓特烈·威廉默默地对抗他们。1805年，奥地利向拿破仑挑战，寻求普鲁士的帮助，但国王不愿意。

但法军在前往奥斯特利茨途中，穿过普鲁士的拜罗伊特时，腓特烈·威廉的

耐心消失了。他邀请俄国的亚历山大在波茨坦开会，在那里，他们宣誓，就在腓特烈大帝的坟墓处，并肩抵抗拿破仑，帮助奥地利。亚历山大的军队进军南方，不幸败北。正当普鲁士的军队动员时，战争结束了。亚历山大逃回俄国。拿破仑给腓特烈·威廉一个宽大、折中的和约（1805年12月15日和1806年2月15日）：普鲁士割让纳沙泰尔、克莱弗、安斯巴赫给法国，但以接收汉诺威作为报答。为了得到这个垂涎已久的奖品，腓特烈·威廉同意所有普鲁士港口对英货的封锁，和法国签订一个攻守同盟。英国向普鲁士宣战。

向复仇女神挑战，拿破仑开始组织莱茵邦联——它包围西日耳曼地区中的普鲁士省份。得到拿破仑秘密地将汉诺威呈献给英国的消息，腓特烈·威廉和俄国订立一个秘密同盟（1806年7月）以防御法国。8月1日，拿破仑将整个西日耳曼纳入其保护之下。8月9日，腓特烈·威廉动员他的一部分军队。9月4日，他重新打开普鲁士港口对英货的贸易。9月13日，他命令他的军队进入萨克森。由于萨克森军队的加入，在不伦瑞克公爵的领导下，他的将官统率20万人。拿破仑认为这是对两个条约和一个同盟的违反，狂怒的他命令已驻扎在日耳曼的军队集中在同盟国的前方和侧翼。他本人则匆匆赶至前方，在同一天，即1806年10月14日，指挥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两地对普鲁士人和萨克森的歼灭战。

此事从法国方面来看，已如上述。从普鲁士方面来看，即是它历史中最黑暗的悲剧之一。腓特烈·威廉和他的政府、家属一齐逃入东普鲁士，并尝试从梅梅尔继续他的统治。拿破仑则从柏林的国王宫室中对欧洲大陆发号施令，并宣布“封锁大陆”（Continental Blockade）。他的军队将普人赶出波兰，在弗里德兰打败俄国人，而护送拿破仑至泰尔西特，在那里他和亚历山大签订和约。于是，腓特烈·威廉获悉必须接受屈辱的条件，借此普鲁士的继续生存将被允许。必须割让易北河西岸的所有普鲁士土地给法国，并将三次瓜分中普鲁士所有窃取的地区归还波兰。必须接受并供应法国士兵在普鲁士的占领开支，直到完全付清1.6亿法郎的战争赔款为止。由于1807年7月9日签订的这个条约，普鲁士失去了它之前拥有土地的49%，及之前所拥有的975万人口中的525万人。在1806年至1808年之间的这几年中，占领部队的费用和赔款的支付耗去了普鲁士的全部收入。凝视着这个惨遭破坏的国家，部分日耳曼人预言：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再在日耳曼历史中重演。

普鲁士的再生（1807—1812）

在日耳曼人的特性中有一个坚强的核心——由于几个世纪来处于外族和好战民族之间艰苦生存而变得坚固——即能骄傲地忍受失败，并伺机反击。当时就有像施泰因的卡尔男爵、哈登贝格、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诸人，无时无刻不在思索如何拯救普鲁士。那些上百万在旧奴隶制度束缚下绝望的农奴——假如他们从屈辱的负荷中获得解放，而且被欢迎加入在土地上或城市中的自由企业的话，他们对普鲁士的经济可能会倾注怎样的活力呢？而现在正被一个遥远的中央政府统治着的这个国家，在轻视商业的贵族控制下无精打采的城市——在自由的激励下探索，他们在工业、商业和财政上，可能发展出怎样的鼓舞进取精神呢？革命的法国已经解放它的农奴，而且繁荣了，但是它将这些城市置于巴黎的政治保护下，为什么不先在暗中对征服者下手，解放农奴和城市呢？

施泰因的卡尔男爵就这么想。施泰因是他家族的祖城，位于兰河（the River Lahn）上，此河在科布伦茨北方注入莱茵河。他不是男爵，而是自由人，属于帝国骑士，曾宣誓保卫他的所有地和王国。他并非出生在施泰因而是在附近的拿骚（1757年10月26日），父亲是美因茨选帝侯的御前大臣。他16岁进入哥廷根大学的法律政治学院攻读。在那里，他研读孟德斯鸠，像孟德斯鸠一样钦慕英国宪法，而且决心成名。他在韦茨拉尔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庭和雷根斯堡的帝国议会进行法律见习。

1780年，他进入普鲁士文职部门，从事威斯特伐利亚制造品和矿坑的管理工作。1796年，他已赢得沿莱茵河所有普鲁士省份的经济管理的主要地位。他的工作能力和他建议的成功使他于1804年奉召前往柏林作国家的贸易部长，在一个月之内，他受命援助财政部。拿破仑已在耶拿粉碎普鲁士陆军的消息传到首都时，施泰因成功地将普鲁士财政部的文件转移到梅梅尔，而由于这些财源，腓特烈·威廉三世得以负担他流亡政府的经费。或许是战争的刺激和种种的不幸激化了国王和他的部长的脾气，1807年1月3日，国王以施泰因“为一个倔强、无礼、顽固和不服从的官吏，他恃才而骄……依情绪和个人的憎恶和怨恨而行动”而罢免他。施泰因回到他在拿骚的家。6个月之后，在听到拿破仑推荐施泰因成为一个行政官时，国王把内政部长的职位赠给了他。

1807年10月4日，他就任新职，而10月9日，他已为国王准备了数百万农民和数以百计的普鲁士自由主义者长久以来祈求的宣言。第一条十分适度地宣布“我们

诸国的每位居民”有权购买和拥有土地，但是这个权利到目前为止一直拒绝给予农民。第二条允许任何一位普鲁士人从事任何合法的工业或商业。因此，与在拿破仑统治下一样，事业开放给任何家系的有才能者，阶级障碍从经济上除去。第十条禁止任何加重农奴制度的行为。第十二条则宣称“从圣马丁节开始，在我们全部的国家中，终止一切农奴身份……将只有自由人”。许多贵族反抗此敕令，而在1811年之前，它一直未曾彻底地执行。

1808年，施泰因和自由主义者辛苦地将普鲁士从具有几乎无限权力的封建男爵或退休的军官或税务长官的统治中解放出来。1808年11月19日，国王，也是一位改革的支持者，发布一项《市政法令》。据此，城市将由当地议会选出自己的官吏来统治，但是大城市不在此例，其市长由国王指派议会选出的三人中的一人担任。健全的地方政治生命于此开始，使日耳曼杰出卓越的市政管理日臻成熟。

在重建普鲁士的工作上，施泰因并不孤独。沙恩霍斯特、奥古斯都·奈特哈特和哈登贝格亲王共同辛勤地重建普鲁士陆军，利用种种策略以逃避拿破仑的规限。这项工作的进展可由施泰因于1808年8月15日写给一位普鲁士军官的信中看出，此信落入法军之手，被刊登在9月8日的《导报》上。其中的部分是这样说的：

愤怒在日耳曼人心中日渐高涨，我们必须培养它，并感动人民。我非常希望我们能和黑森、威斯特伐利亚联系，而且我们应为必定发生的事件做准备，我们应该寻求和有活力、友好的人们保持关系。因之，我们能使这样的人民和其他人接触……西班牙诸事留下一个鲜明印象，它们证明了我们早已应该怀疑之事。这些消息如果审慎地散布开来将会有用，我们认为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将是决定欧洲命运的战争。

拿破仑在即将为西班牙一个主要战役而离去时，下令腓特烈·威廉开革施泰因。国王仍在梅梅尔，迟不听命，直到他被警告：法军将继续他们在普鲁士领土的占领直到他服从为止。1808年11月24日，施泰因再度被罢免。12月16日，拿破仑从马德里发布一道命令，将其放逐，没收他的所有财产，并下令只要他被发现在法军控制的任何地区，他将遭到逮捕。施泰因逃入波希米亚。

他对普鲁士的损失，因哈登贝格被任命为国家大臣（1810年）——实际为首相，而获得补偿。他曾是政府的一员，重组过财政部，商议过1795年的和约，分担过1806年失败的责任，曾在拿破仑的坚持下被罢免过（1807年）。现在，他已60

岁，拿破仑温柔地全神贯注于他的新皇后时，哈登贝格曾经说服国王首先召集一个贵族议会（1811年），然后（1812年）是具有咨询能力的国家代表议会，以其为国王的针砭和激励，而将其移向君主立宪政体。作为一个法国“哲学”的崇拜者，哈登贝格征用教会财产，强调犹太人的公民平等（1812年3月11日），征收贵族的财产税和商人的利润税，结束同业公会的垄断，确立事业和贸易的自由。

普鲁士于1807年至1812年的快速重建显示了日耳曼特性中一种丰富的潜力。在敌对的法军眼下，在普鲁士较弱的国王的统理下，非贵族的施泰因和哈登贝格着手重建一个被打败、占领和破产的国家，而在6年中，将其提升为一个强有力而且值得自豪的国家，使其于1813年成为“解放战争”（War of Liberation）中实至名归的领导者。每一阶层都努力地加入工作：贵族出来领导陆军，农民接受征召，商人献出他们大量的利润给国家，文人和学者向全日耳曼民族呼吁新闻、思想和礼拜的自由。1807年，在由法军管治警务的柏林，费希特发表了著名的《告日耳曼民族书》（“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要求受训练的少数人引导普鲁士人民走向道德净化和国家更新。1808年6月，在柯尼斯堡，某些大学教授组织了一个“道德和科学同盟”（Moral and Scientific Union），后来成为著名的“道德同盟”，致力于普鲁士的解放。

其时，施泰因正徘徊在放逐、贫困及随时被捕或被杀的危险中。1812年5月，亚历山大一世邀请他加入圣彼得堡的帝国法院。他去了，在那里，他和他的主人等待着拿破仑的到来。

第六章 | 日耳曼民族

(1789—1812)

经济

1800年的日耳曼是一个具有阶级意识的民族，接受阶级区分，将它当作社会秩序与经济组织的制度，仅有极少数的人拥有非世袭的贵族头衔。“在日耳曼，”斯塔尔夫夫人记录道，“每个人都保持他在社会中的阶层和身份，好像那是他已确定的职位一样。”就大体而论，日耳曼是较法国人更具有耐力的民族。

法国大革命鼓舞了文学，但在工业上影响轻微。日耳曼富有天然资源，但封建制度的持续和封建男爵的权力，使中部和东部国家延缓了一种商业和制造业阶级的兴起，而这一阶级若由一种自由和无阶级差别经济的刺激，将会从土壤中挖掘出丰富的煤和金属供给工业。贸易获助于富庶的河流——莱茵河、威悉河、易北河、萨勒河、美因河、斯普里河、奥得河，但诸国的分裂使道路短、少、坏，沿途还有强盗和封建通行税。贸易因同业公会的管理、高税及地理上各式各样的度量衡、币制和法律而受阻。

直到1807年，日耳曼的工业遭到由最新机械所制造的英货的竞争，英国享有工业革命领先30年的利益，它禁止输出新工业技术或熟练的专技人员。具有两面性的战争，孕育了供人民衣食、使人民丧命的工业，同时滋养了国家的经济。而1806年之后的“大陆封锁”，多多少少排拒英货，帮助了大陆工业的成长。采矿业和